

中古音论

张渭毅

著

河南大学出版社

繕

膳膳

說文

單父

姓鄯

揮

檀

博雅

緘

端

說文

縛

雙縛

拽

績

績

難

簞

今天也一日讓也玉庚

擅

或作擅

儻

釧

玼

揣

𦵏

軻

單父

單父

白理

博雅

地穿

視專

方言

下田

數

中古音论

张渭毅 著

河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古音论/张渭毅著. —开封: 河南大学出版社, 2006. 9

ISBN 7-81091-525-8

I. 中... II. 张... III. 汉语—中古音—研究 IV. H11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6) 第112020号

书 名 中古音论
张渭毅 著

责任编辑 王四朋

装帧设计 王四朋

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

地址: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85号 邮编: 475001

电话: 0378-2864669 (行管部) 0378-2825001 (营销部)

网址: www.hupress.com E-mail: bangong@hupress.com

经 销 河南省新华书店

制 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

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

版 次 2006年9月第1版

印 次 2006年9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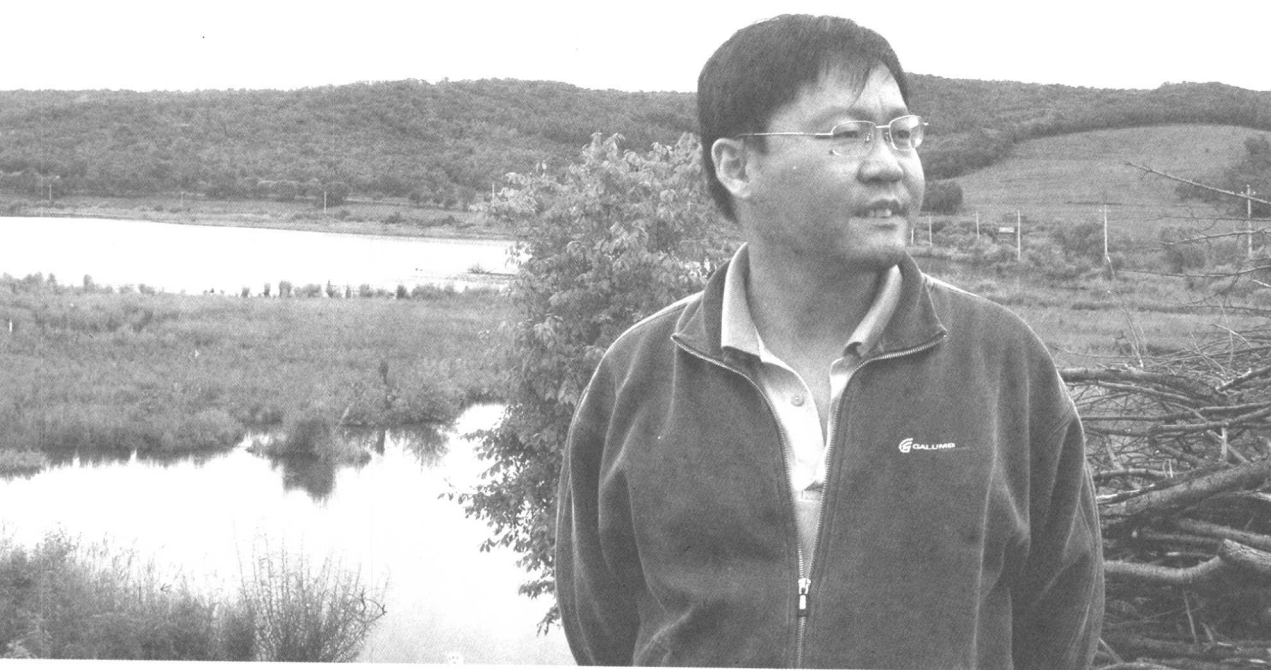
印 张 27.75

字 数 591千字

印 数 1-2000册

书 号 ISBN 7-81091-525-8/H·148

定 价 56.00元



作者近照

张渭毅，男，1966年10月1日生，陕西省渭南市人。1984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，1988年7月获文学学士学位，1991年7月获文学硕士学位，同年7月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近代汉语室工作。1994年9月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史专业博士研究生，1997年7月获文学博士学位，留系任讲师。2000年8月起，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。研究方向为汉语音韵学、汉语语音史和中国语言学史，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，负责主持并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《〈集韵〉的综合研究》。曾获得2004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一等奖、2006年北京大学第十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。曾任韩国国立顺天大学中文系客员教授、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访问学者、台湾实践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专任客座副教授。并任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理事、副秘书长。

序

“中古音”这个概念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之内曾经等同于《切韵》音,随着汉语语音史研究的深入开展,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:《切韵》音是研究中古音最为重要的参考资料,但中古音的研究不能只限于《切韵》,从魏晋到隋唐的语音资料,都应该是中古音的研究对象。就韵书音系而言,《集韵》音系的研究,其意义不亚于对《广韵》音系的研究,《集韵》称得上是汉语语音史的一个大宝库。清代乾嘉学人如段玉裁等也很看重《集韵》,但他们的重点在校勘。一是《集韵》的校勘,一是利用《集韵》校古书。孙星衍《与段大令若膺书》说:“《玉篇》、《集韵》校《说文》大有用处。”此乃当时学人的共识。

考订、校勘是历史文献研究的基础工作,就《集韵》而言,这种性质的研究还要花大力气才能取得突破性的、总结性的成果,而作为汉语语音史来要求,《集韵》音的研究尤应重视。海内外学人有以此为专题者,已取得相应的优秀成果,而对于相当复杂、相当重要的异读字问题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。张渭毅博士以《集韵》异读字作为突破口,进军中古音领域,经过十多年的刻苦钻研,已取得丰硕成果,选入本论集的十一篇文章和一篇翔实、非常有价值的中古音论著目录就是明证。

这十一篇文章有关《集韵》音的研究就有七篇之多,还有专著《集韵之研究》、《汉语语音史大纲》、《互注集韵校本》等也将陆续出版问世。

这些文章对《集韵》音系研究有什么重要意义呢?有哪些新发现呢?

他探讨了《集韵》异读的来源、《集韵》异读形成的原因,对《集韵》异读进行了层次分析,确立了以异读音变规律作为划分异读层次的标准,提出了《集韵》折合字音的双重语音标准,还研究了《集韵》音与《广韵》音的关系、与《类篇》音的关系、与《群经音辨》的关系。视野开阔,立论严密,取材丰富,新见迭出,是这些论文的共同特点。

经过深入考察,他发现《集韵》一、二、四等反切上字与三等反切上字已经没有分组的趋势;一等、二等、普通三等和重组三等是一类,纯四等和重组四等是一类,这种唇牙喉音的分组格局,也是《集韵》切上字的重要特点;关于介音,作者发现重三和普三的介音同类[j],重四和纯四等介音同类[i]。这类研究,对于认识《集韵》的时音特点有重要意义。

从唐末五代到宋朝,就汉语语音发展史而言,已进入近代语音阶段,若仅以此为据,则《广韵》、《集韵》均成书于宋代,似乎难以列入中古音系统。但人所共知,《广韵》继承《切韵》,它的语音系统是中古的;而《集韵》音则具有双重性,它的音系框架、大的类别,基本

遵循《广韵》，无疑也当作中古音来研究。而《集韵》对反切字的种种改良以及某些新增小韵，又的确是时音的反映。《集韵》异读字总数达三万多，其中就有时音问题。揭示《集韵》有哪些时音特点，任务艰巨，渭毅博士知难而进，已有不少收获。但我们还没有办法以《集韵》音为根据，建立一个完整的《集韵》时音体系，所谓“叠置多种音系”，还只是一种笼统说法，因为多种“成分”不等于“多种音系”。

《广韵》、《集韵》均存在“重组”，这是事实。我个人对“重组”问题兴趣不大，因为这个题目已经做烂了，可是我对渭毅的重组研究却相当欣赏。

《魏晋至元代重组的南北区别和标准音的转变》一文是渭毅博士学术研究进一步成熟的标志，这篇论文展示了作者的思维能力和学术才华。一个学人思维能力的高下，主要表现在综合与分析这两点上。有人能分析不能综合；有人能综合不能分析；有的人甚至既不长于分析，也不善于综合。综合是一种很高的本领，古今中外的大家无不得益于综合。从柏拉图到康德，从郑玄到朱熹，无一不是综合大家。只有综合，才能创新，才能高屋建瓴，调兵遣将，一切材料为我所用。《转变》一文运用分析与综合的功夫，预示这位学者将有着广阔的学术前景。文中的那些结论，“南方分三四等韵，却难分难辨重组，北方区分重组，但重四和纯四不分。《切韵》是以金陵音为主体的、参酌邳下音而形成的综合音系，它的重组以金陵音为基础，三四等介音三分……”，你可以不赞成这些结论，但这些结论的确可以令人解颐。

综观张渭毅十余年来的治学历程，我以为他已经掌握了为学两字诀。这两字诀窍就是“专”与“壹”。

“专”有多种意义，可以是指用心要专，也可以是指研究的对象要专，也可以是指研究的目标要专。“专”是方法论的问题。无论从哪种意义上来说，不专则不精。不专不精，则难以成为学问家。“蜻蜓点水”式的所谓研究，“羊头上搔搔，狗头上摸摸”式的所谓研究，都是学术研究的大忌。张居正曾教训自己的儿子：“是必志骛于高远，而力疲于兼涉，所谓之楚而北行也。欲图进取，岂不难哉！”左宗棠也教育自己的孩子：“读书用功，最要专一无间断。”张渭毅在一定时期之内专攻《集韵》，专攻中古音，故能作精深的研究。待攻占一个阵地之后，再移师他向，然后把若干点联成一片，就能达到广博与精深。不专而求博，不精而求深，都是“所谓之楚而北行也”。

何谓“壹”？《荀子·解蔽》说：“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。”黄侃说：“为学须牢记此语。”这是认识论的问题。一个人的学术研究能否取得成就，与研究者的主观认识能力有绝对关系。荀子为什么说不能以那个“一”来损害破坏这个“一”呢？“一”是与“两”相对而言的。“同时兼知之，两也；然而有所谓一。”“一”就是事物的殊相，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殊相，科学研究就是要认识各不相同的殊相。所以，不拿这个事物的殊相来干扰损害另一个事物的殊相，这就是“壹”，也就是把握该事物的专壹的特性，这是最根本的，故黄侃说要“牢记此语”。南方的重组不同于北方的重组，各种异读字的语音问题，其中都包括

着“壹”的道理。笼而统之,混而不分,或分而无序,都是“以夫一害此一”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,那个就是那个,这个就是这个,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,不就是求真务实吗?目光要像刀子那么锋利,把事物中的“一”——一切割出来,条分缕析,纯一无间,这种本领既是天生的,也是可以培养锻炼的。人们常说的“脑子糊涂”、“一锅粥”,在学术研究中的表现,就是“以夫一害此一”。

年轻人,气盛,往往勇于批判古人。古人也有说错话的时候,也有各种各样的疏漏,即使是大学问家,也在所难免。我们对古人应有同情性的理解,本书在引用宋祁“《说文》朴无樸音”时,批判其“无知”,用语是否太苛刻?如果我们从积极方面来理解,这条材料本来很有价值。大徐本《说文》“朴”“樸”同音,均为匹角切,大徐用的是孙愐《唐韵》音切,从孙愐到宋祁,已有三百年左右,“朴”已由入变去(平豆反),而“俗以朴为樸”。入声一读不仅古已有之,俗语犹存。可宋祁偏偏说“《说文》朴无樸音”,他的取音标准是什么呢?李衍也犯疑,但只问了一句“何耶?”表示很不理解,仅此而已。宋祁在这一问题是否真属“无知”,我不敢相信。何况阮元说:“善论人者,略其短而著其功,表其长而正其误,若苛论之,虽孟、荀无完书矣。”(《毛西河检讨全集后序》)另外,所引李衍“跋”文,脱字有15个之多,可能所据版本有问题,应据他本补正。

郭绍虞《了一先生像赞》云:“不矜己长,不攻人短。”王门弟子如唐作藩先生、杨耐思先生、曹先擢先生、蒋绍愚先生,都能承继先师遗风,后来者宜深思。

庄子说:“夫丰狐文豹,何罪之有,其皮为之灾。”渭毅博士初出茅庐,崭露头角,就遭受无理打压。可是,我们不要忘了,渭毅先生来自司马迁的故乡,那里有文武之道,有汉唐遗风,还有延安精神,这样的人是压不垮的。就在两年前,他的论文荣获了中国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一等奖。孔圣人说得多么好呀:“后生可畏,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?”

是为序。

何九盈

2006年8月21日于北京西郊蓝旗营

目 录

序	何九盈 (1)
《集韵》研究概说	(1)
《集韵》异读研究	(39)
关于《集韵》异读的层次分析的问题	(73)
贾昌朝《群经音辨》改良反切的尝试及其对《集韵》的影响	(84)
论《集韵》折合字音的双重语音标准	(97)
《集韵》重组的特点	(108)
《集韵》的反切上字所透露的语音信息	(121)
陈澧《切韵考》考证条例研究	(178)
魏晋至元代重组的南北区别和标准音的转变	(196)
中古音分期综述	(255)
1950 ~ 2004 年国内中古音研究综述	(268)
1900 ~ 2006 年上半年国内中古汉语语音论著目录	(338)
追记	(424)
后记	(433)

《集韵》研究概说

【提要】本文评述了近三百年来的《集韵》研究史,指出《集韵》研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,提出《集韵》研究的方法论,阐明今后《集韵》研究的方向。

一、《集韵》的流布情况和研究史的分期

《集韵》成书于北宋仁宗宝元二年(1039)九月,庆历三年(1043)八月十七日雕印完毕,由国子监颁布施行,跟景祐四年(1037)成书的《礼部韵略》组成详略配套、两位一体的科举考试的规范韵书。然而《集韵》的刊行和流布,却远远不如《礼部韵略》频繁和广泛。

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(1187),田世卿陕西安康金州军《集韵》刻本的跋文说:

卿旧闻《集韵》收字最为赅博,搜访积年,竟未能得,皆云此版久已磨灭,不复有也。世卿前年蒙恩将屯安康,偶得蜀本,字多舛误,间亦脱漏。……继得中原平时旧本重校,修改者一百五十五字。旧本虽善,而书字点画亦有谬误。复以《说文》、《尔雅》等书是正,改定凡五百一十五字。因令镂板,以广其传。自淳熙乙巳九月至丁未五月,仅能毕工,亦庶几不作无害有益之义也。^①

可见,在《集韵》刊行后142年,田氏于孝宗淳熙乙巳年(1185)重刻《集韵》时,《集韵》在民间已经罕见,得之不易。除田刻本外,南宋绍兴年间的明州(今宁波)和孝宗朝的潭州(今长沙)都有《集韵》刊刻印行。^② 尽管如此,《集韵》在以后各朝还是不显。元明乃至清初,《集韵》没有刊刻过。明清两朝,《集韵》只是作为稀世珍品藏于皇家内府秘阁^③,民间难以获睹。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就曾怀疑《集韵》不存于世,他说:“今《集韵》不

① 淳熙十四年(1187)田世卿《集韵》刻本,今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,蒙日本学者大西克也先生提供材料,谨致谢忱。田世卿跋文又见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,p148-150,中华书局1983年。

② 参看冀淑英(1994),李致忠(1985)。

③ 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刻本《集韵》,早在明正统六年(1441)就已收归内府,今各卷卷端仍骑栏铃有“文渊阁印”。乾隆年间此书入藏于天禄琳琅,今各卷卷端铃有“天禄继鉴”、“乾隆御览之宝”,各卷之末端还铃有“天禄琳琅”。参看李致忠文,出处同注2。

存,而后人所祖述者皆本之《韵略》耳。”^①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·音论提要》也说:“(顾氏)书成于崇祯癸未,其时旧本《集韵》与别本《广韵》皆尚未出,故不知唐宋部分之异同由于陈彭年、丁度。”^②

《集韵》作为官修韵书,刊行稀少,流布不广,除了篇幅过多、刊刻不易的表层原因外,究其深层原因,主要有三条。

第一,北宋科举制度的改革,学术风气的转变,客观上阻碍了《集韵》的刊布。

《集韵》卷末牒文说:

景祐元年三月,太常博士直史馆宋祁、三司户部判官太常丞直史馆郑戢等奏:昨奉差考校御试进士,窃见举人诗赋多误使音韵,如叙序、座坐、底氏之字,或借文用意,或因释转音,重叠不分,去留难定,有司论难,互执异同。

因此,《集韵》编纂的一个主要任务,是为举人诗赋考试提供择音取字的依据和判断正误的标准。

但是,《集韵》刊行以后,北宋的三次兴官学运动,却对《集韵》的流布造成了不利影响。

宋仁宗庆历四年(1044),范仲淹推行“庆历兴学”,针对当时“国家专以辞赋取士,以墨义取诸科”^③的现状,规定进士考试“先策论而后诗赋”,“使人不专辞藻,必明道理”。这种重策论、轻诗赋的科举改革,虽然不到一年便因范仲淹的罢政而夭折,但影响深远,必定冲淡了读书人对《集韵》的依赖。

从宋神宗熙宁四年(1071)到元丰八年(1085),王安石掀起了第二次兴学运动,大张旗鼓地改革科举制度,废除明经科,进士考试取消诗赋、贴经和墨义,改试经义和策论。熙宁六年(1073),王安石组织人力,对传统教材——儒家经籍重新训释,同王雱、陆佃等人分别撰写《周官新义》、《诗义》、《书义》,合称《三经新义》,熙宁八年(1075),颁发全国学校,作为教科书和考试的标准^④,“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,主司纯用以取士,先儒传注,一切废而不用”。^⑤王氏还撰有《易解》二十卷、《洪范传》一卷、《新经周礼义》二十二卷、《论语解》十卷、《孟子解》四十二卷等,皆行于场屋。^⑥晚年著《字说》二十四卷,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,“学者争传习之,且以经试于有司,必宗其说,少异辄不中程”。^⑦从哲宗元祐二年

①② 分别见于顾炎武《音学五书·音论》卷上,p27;卷首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·音论提要》,p12,中华书局1982年。

③ 见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,《范文正公集》卷九。

④ 参见《宋史》卷一五五《选举志》第一百八,p466-469,《二十五史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。王春德《宋代教育》p34-35,p290-291,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。

⑤ 见《文献通考》卷三十一。

⑥ 参见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。

⑦ 参见《宋元学案·荆公新学略》。

(1087)至绍圣初年,虽然短期内实行进士诗赋考试,但哲宗亲政后,恢复了神宗旧制,罢诗赋,专习经义策对。在王氏学说风行场屋的学术背景下,《集韵》这部诗赋考试的标准工具书当然得不到重视。

宋徽宗崇宁元年(1102),蔡京当权,恢复熙宁、元丰时期的改革措施,掀起第三次兴学运动,取消科举,推行三舍选考法取士,直至钦宗靖康元年(1126),诗赋进士科才恢复。在这种大环境下,田世卿跋文所云《集韵》旧版“久已磨灭,不复有也”的命运自然难以避免。

第二,《礼部韵略》和《平水韵》两个系列的韵书是宋和金元明清科举考试的金科玉律,它们的风行和广大士人的尊崇,减少了对《集韵》的需求,客观上排挤了《集韵》的地位。

《集韵》卷帙繁多,内容庞杂。因此,早在景祐四年(1037)六月丙申,即《集韵》撰作的第四个年头,丁度等应科举考试急需,在已经成型的《集韵》未定稿的基础上,提取举子诗赋中常用的字形、字音和字义,缩编成略本韵书,作为考官和举人共同遵守的审音定韵的标准,因为由礼部审定颁行,故名为《礼部韵略》。^①《礼部韵略》最初收字 9590 字^②,篇幅小,“字既简约,义多雅驯”,“中间奇字僻韵多遭刊落”^③,实用性强,故颇受礼部的重视和举人们的青睐,在宋代推行诗赋考试的各朝,《礼部韵略》及其增订本成为场屋必备的工具书,并在使用中不断得到增订和完善。《礼部韵略》的命运,是跟诗赋考试和举子的前途联系在一起的,什么时候朝廷实行诗赋考试,什么时候《礼部韵略》就得到修订和增补。北宋时期,《礼部韵略》仅得到一次增订。^④哲宗元祐二年(1087)改革科举法,进士科分

① 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说:“其曰略者,举子诗赋所常用,盖字书、声韵之略也。”王之望《汉滨集》卷五《看详杨朴〈礼部韵括遗〉状》说:“礼部韵止为场屋程文而设,非如《广韵》、《集韵》普收奇字,务为该洽,故谓之韵略。”可作《礼部韵略》命名原由的注脚。

② 张萱《疑耀》说:“《礼部韵略》初仅九千五百九十字,续降六十有五字。”《古今韵会举要凡例》也说:“《礼部韵略》元收九千五百九十字。”但宁忌浮据曹本《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》统计,有 9564 字,少 26 字,可能与避庙讳有关。宁说参见宁忌浮《古今韵会举要及其相关韵书》,p81,中华书局 1997 年。

③ 邵长蘅《古今韵略叙录》,见谢启昆《小学考》卷三十一,十五叶 b、十六叶 a,浙江书局刻本。又绍定庚寅重刊本《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》所附《韵略条式》“绍兴十三年二月十二日牒文”说:“伏缘礼部韵专谓约束举人程文,只得押韵内字,庶几便于考校,故名《礼部韵略》。若广引训释,及添入不紧要字,即与《广韵》无异。”

④ 根据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卷一《事始》“郑宋修《韵略》”,庆历年间,张希文开始对《礼部韵略》的异读字加圈互注,“礼部因之,颇以为便”。这是互注《礼部韵略》的最早的记录。加圈互注不同于附加“释文”和“增修”,只是互注出异读字的又音,显示互见出处,便于查检异读字音义,没有增删韵字,增加注释,更改字音,因此还不能算作真正的修订。又《能改斋漫录》成书于绍兴二十四年(1154)至二十七年(1157)间,据吴曾说,《礼部韵略》一共刊修过三次,第一次是景祐年间始修《礼部韵略》,第二次是张希文的互注《礼部韵略》,第三次是元祐年间校正《礼部韵略》,即孙谔修订本。由此推测,元祐五年(1090)至绍兴二十七年(1157)间,《礼部韵略》没有再次修订过。参见《能改斋漫录》上册,p15,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。

别考诗赋和经义,“欲习诗赋人,止试诗赋,不兼经义”,“不习诗赋人,令治两经”。^①一时间,“举人初习声律,动多疑虑,加以经传音释与礼部韵间有不同,及自来传袭又多讹谬,虽主司考校亦无定论,临时率以私意去取”。^②有鉴于此,元祐五年(1090),太学博士孙谔等针对诗赋考试中同义异读的韵脚字、音义不同的混用字、失收的经典常用字、避讳字等问题,提出改正和补充意见,经国子监审核议定,附入景祐《礼部韵略》相应的韵字之下,由礼部镂版颁行。孙谔修订的韵字不多,只有51字,但这一举措影响很大,后来重刊的各种《礼部韵略》增订本,都是步孙谔后尘,在元祐修订本基础上扩充、删削的。“靖康之乱”后,宋室南渡,文化重心也随之南移。江南士人崇尚诗赋,朝廷重视诗赋考试。从建炎二年(1128)开始,沿袭元祐科举法,省试、殿试中,诗赋、经义两科考试各自同时进行,绍兴三十一年(1161)成为定制。^③在诗赋考试取士的大气候下,官方和私人出版了一大批《礼部韵略》增订本,据宁忌浮(1997, p77-80)的统计,文献著录的南宋这类著作有12种,^④而且刊印的次数多,如官修的《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》,根据《韵略条式》提供的信息,从绍兴四年(1134)到嘉定十六年(1223),在高宗、孝宗、光宗和宁宗各朝都有修订重印,计14次。又如沿袭《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》而作,成书于理宗时的私家著作、欧阳德隆的《押韵释疑》,就很受学子欢迎,“书肆版行,漫者凡几,一漫则一新,必增数注释,易一标题,以快先睹,是非可否不暇计焉”。^⑤广大士人为求功名,视《礼部韵略》为“金科玉条,不敢一字轻易出入”^⑥,唯恐“以声病被黜”^⑦。某些文人耗费大量精力修订《礼部韵略》,如毛晃以十年之力增修监本《礼部韵略》,作《增修互注礼部韵略》,其子毛居正又加以增补校勘。在时尚和功利的驱使以及趋简厌繁的心理作用下,大多数学子无暇顾及《礼部韵略》的详本——《集韵》,是理所当然的。《集韵》经学色彩过于浓厚,如果举子要参考规模更大的韵书,宁可选择价格便宜、虽“繁略失当”但篇幅较小的《广韵》,^⑧而《集韵》的用途较小,礼部考官和少数学者只根据它补充《礼部韵略》失收的某些韵字,提供某些韵字押韵和释义的理据。随着宋朝的灭亡,《礼部韵略》退出场屋,《集韵》就少有问津者了。

① 见绍定庚寅重刊本《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》所附《韵略条式》“建炎二年五月四日”牒文所引元祐法。

② 见绍定庚寅重刊本《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》所附《韵略条式》“元祐五年七月初十日”牒文。

③ 见绍定庚寅重刊本《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》所附《韵略条式》“建炎二年五月四日”牒文。《宋史》卷一五五《选举志》第一百八, p466-469,《二十五史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。

④ 据《古今韵会举要自序》,两宋时跟《礼部韵略》相关的考试韵书有五十余种。今所见著录的有12种,除去北宋张希文的《互注礼部韵略》外,加上毛晃、毛居正父子的《增修互注礼部韵略》,共12种。

⑤ 见曹棟亭本《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》卷首所附郭守正《序》,光绪二年川东官舍重刊本。

⑥ 见《古今韵会举要自序》,明刊本。

⑦ 《能改斋漫录》上册, p15,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。

⑧ 见平田昌司(1996)。

在北方地区的金元两朝,刊行于1229年的金人王文郁的《新刊韵略》和刻印于1225年的元人刘渊的《壬子新刊韵略》,跟《礼部韵略》无传承关系,是在《景德韵略》的基础上分别并韵为106韵和107韵,这两个《平水韵》刊本及其增补本《韵府群玉》(1314年)等,成为金元两代科举考试的标准。^①

跟《平水韵》有传承关系的同系统韵书《诗韵辑略》(1563年)和《佩文诗韵》(1716年)分别是明清两代权威的科举考试用书。

综上所述,《礼部韵略》和《平水韵》韵书兴而《集韵》衰,《礼部韵略》和《平水韵》韵书盛行而《集韵》不显。

第三,《集韵》异读字占所收字数的三分之一强,但字头下不标注又切,难于检索,极大地降低了它的实用价值,影响了它的普及。

《集韵》字下不注又切,自有其编纂目的。《广韵》异读字有4595个,有异读8041个,其中异读字下所注又切有3695个,互见又切占十分之七八,异读字下不注又切的异读有4346个,也就是说,注出又切的异读还不及异读总数的一半,而且还有十分之二三的又切是不互见的讹切。^②这说明,《广韵》大多数异读字的注解是不注又切的。此外,不少异读字下的又切没有注全,有漏注现象。这种情况当然不能简单地归咎为《广韵》作者的疏漏和失误。确定异读字,既涉及到审音问题,又有辨形问题,始终是韵书编纂的难点。《集韵》异读字有11910个,是《广韵》的两倍半,遇到的困难比《广韵》大得多。《集韵·韵例》说:“凡一字之左,旧注兼载它切,既不该尽,徒酿细文;况字各有训,不烦悉箸。”一方面,《集韵》作者批评了《广韵》注又切不完备的缺点,另一方面,又看到了注又切的困难,但不是积极地解决困难,而采取了回避矛盾的态度,以为“字各有训”,就可以“不烦悉箸”又切,忽略了韵书的字音检索功能。这种做法实在是重大的决策失误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对此有很中肯的批评:“至谓兼载他切,徒酿细文,因并删其字下之互注,则音义俱别与义同音异之字难以遽明,殊为省所不当省。”^③有了这种认识,我们不难解释《类篇》编纂的缘由。宝元二年(1039),《集韵》告竣,紧接着,《类篇》上马编纂,就是为了解决检索《集韵》字音的难题。《类篇》以字形为纲编排《集韵》韵字的形、音、义,在内容上跟《集韵》有很大的共性,但又对《集韵》的少数又音删、改、并,在释义和异体字的处理上跟《集韵》多有不同,体现了编者的意图,是一部与《集韵》相副施行的、有相对独立性的字书。

《集韵》是《广韵》的增修本,收字多,字音齐全,训释较为合理,体现了《广韵》所不具备的较多的优越性。但字下不注又切的局限,阻碍了它的流布。《礼部韵略》和《平水韵》系统的韵书收常用字,字数少,前者注释简略,后者增收韵藻,都不能满足诗赋考试以外的

① 见宁忌浮(1995, p139-149)。

② 参见余迺永《〈互注校正宋本广韵〉序》,台北联贯出版社1980年。

③ 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四二,经部小学类三《集韵》, p359,上册,中华书局1987年。

注音释义的要求;《类篇》收字多,但它是字书,篇幅太大,韵书的归韵、检索功能不能直观地体现出来。因此,无论是在两宋,还是宋以后各朝,篇幅适中的《广韵》由于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,总是受到文人的欢迎,代代刊刻,通行不衰。

《集韵》不显于世的局面直到清初才得到根本改观。祖本为北宋庆历原本的南宋明州本《集韵》被清人钱曾收藏后,才有两种影抄本——钱氏述古堂和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行世。^①毛氏汲古阁藏有两部影抄本:一部为朱彝尊所得,朱氏委托曹寅在康熙丙戌(1706年)九月刊刻于扬州使院,世称“楝亭本《集韵》”;另一部经毛扆根据南宋长沙刻本《集韵》影钞本粉涂校改,今藏于宁波天一阁。^②

《集韵》经曹寅刊刻复出后,立即引起乾嘉派学者的重视。乾嘉学派领袖戴震、钱大昕、段玉裁、王念孙等依据《集韵》,或稽考《广韵》的韵例,或考求古韵,或疏证古义。段玉裁还校勘过毛氏汲古阁影宋钞本,并考证此本的底本是宋仁宗原本,高度评价了《集韵》在古音研究中的价值,他说:“丁度等此书兼综条贯,凡经、史、子、集、小学、方言采摭殆遍,虽或稍有纰缪,然此是资博览而通古音,其用最大。”^③楝亭本《集韵》的大量刊印和广泛流布,提供了《集韵》研究的先决条件,而段玉裁等小学领袖的推崇和提倡,则掀起了《集韵》研究的热潮。清代《集韵》研究者大多生活在乾隆、嘉庆、道光年间,这决非偶然,跟这个时期的语言学、考据学的学风有密切关系。

有了楝亭本《集韵》的刊布,才有《集韵》的研究。因此,把《集韵》研究史的上限定在楝亭本《集韵》的刊刻年即康熙45年(1706),是很合适的。第一个对《集韵》进行研究的,当推版本学家毛扆。《集韵》的研究,至今已有291年的历史。总结和评价《集韵》的研究成果,以确定新的研究起点,是很有必要的。

有清一代,直至民国初年,《集韵》的研究主要在校勘、考证方面。系统地就《集韵》音系的一个专题提出看法的,始于白涤洲(1931)。从此以后,《集韵》研究的重点转向音系问题的探讨。因此,白涤洲的《〈集韵〉声类考》(1931),可以看作《集韵》研究的分水岭,白文以前的研究主要是文献学的范畴,白文以后的研究才真正进入到音韵学的领域。以白涤洲(1931)为界限,根据《集韵》研究的内容和性质的不同,《集韵》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以校勘、考证为主的研究和以音系为主的研究两个阶段。

① 见冀淑英(1994)。

② 见赵振铎(1993)。

③ 段玉裁《集韵》校跋,见于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,p150-151,中华书局1983年。

二、以校勘、考证为主的《集韵》研究(1706~1931年)

校勘、考证《集韵》的方法,正如黄侃(1983,p175)所说:“校《集韵》已有二术:一曰校《集韵》诸本,二曰校《集韵》所引诸书。”前一种方法,即参校比勘《集韵》的各种版本,订正讹误,填补阙漏。后一种方法,即根据《集韵》所引的现存诸书的音义,校勘、考证《集韵》引用的音义的疏漏讹误。校勘、考证的成果主要以校本、序跋等形式体现出来,根据前人的研究和我们的调查、钩稽,这一阶段有《集韵》校本 26 部,序跋 21 篇。邱荣竊(1974,p984-994)《集韵研究》曾列出 18 部《集韵》校本的著录、存佚和收藏情况,其中 15 部是 1931 年前发表的,因邱著在大陆地区难以见到,今按校本名称、卷册、底本的版本、序跋和藏址抄录如下:

①余萧客手校本,十卷,曹刻本(按:邱氏未见);

②段玉裁校本,五册,曹刻本,有段玉裁跋,日本静嘉堂文库藏;

③钮树玉校本(按:邱氏未见);

④严杰校本(按:邱氏未见);

⑤陈奂校本,十二卷五册,周漪塘藏毛子晋影宋抄本的覆抄本十卷四册^①,有段玉裁跋和马钊校勘记二卷一册,台北中央图书馆藏;

⑥汪远孙校本(按:邱氏未见);

⑦陈庆镛校本(按:邱氏未见);

⑧方成珪《集韵考证》十卷,曹刻本,卷首有吴钟骏、黄式三序和方氏自序,卷末有孙诒让跋,道光丁未年刊本,又瑞安孙衣言刻永嘉丛书本、万有文库影印日本天保重刊顾本(按:邱氏未列藏址^②);

⑨马钊《集韵校勘记》,二卷,底本为陈奂覆抄的毛氏汲古阁影宋钞本,即天一阁本,有陈奂序,杨守敬藏本,今藏于台北中央图书馆;^③

⑩陈鱣、李貽德合校本,十卷八册,台北中央图书馆藏(按:北京图书馆藏有陈鱣录段玉裁校跋本,十卷,底本为曹刻本);

① 根据赵振铎(1993)的考证,周漪塘所藏毛氏汲古阁影宋钞本今藏于宁波天一阁。

② 除万有文库影印本外,《集韵考证》还有三个版本:(1)温州市图书馆藏稿本;(2)温州市图书馆藏清孙锵鸣抄本;(3)杭州大学图书馆藏清光绪刻本,孙诒让校,存一卷

③ 马钊《集韵校勘记》还有四个版本:(1)杭州大学图书馆藏清同治十二年孙氏玉海楼抄本,清孙诒让校并跋;(2)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抄本;(3)南京图书馆藏清丁士涵家抄本;(4)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稿本。

⑪顾广圻校本(按:邱氏未见,北京图书馆有顾广圻校本,存1~8卷,底本为曹刻本,有顾之逵跋和段玉裁校跋);

⑫罗以智校本(按:邱氏未见);

⑬陆心源《校集韵》,四卷,曹刻本,有陆氏自序,收入《潜园总集群书校补》;

⑭日本天保重刊顾校批校本,不著批校氏名,日本静嘉堂文库藏;

⑮董文涣校本,十册,曹刻本,董文涣跋(按:邱氏未见,北京图书馆藏此书,校勘者姓名作“董文焕”)。

除邱氏所列外,还有11部校本,仍按校本名称、卷册、底本的版本、序跋和藏址开列如下:

⑯吴騫、丁士涵、许克勤校本,十卷,曹刻本,上海图书馆藏;

⑰莫友芝、莫绳孙校本,十卷,嘉庆十九年重修曹刻本,录有清周锡瓚跋、段玉裁跋和叶景葵跋,并录清袁廷樾、钮树玉、陈庆镛、黄彭年校语,上海图书馆藏;

⑱袁廷樾、劳权校本,存1~8卷,曹刻本,上海图书馆藏;

⑲韩泰华校本,十卷,嘉庆十九年重修曹刻本,有韩泰华跋并录段玉裁校跋,北京图书馆藏;

⑳汤裕校本,十卷,嘉庆十九年重修曹刻本,有汤裕跋并录马钊校语,北京图书馆藏;

㉑庞鸿文、庞鸿书校本,十卷,嘉庆十九年重修曹刻本,录有汪道谦、韩泰华校跋,复旦大学图书馆藏;

㉒卫天鹏校本,十卷,嘉庆十九年重修曹刻本,有王秉恩录清黄国瑾、朱一新、钱振常、钱恂、濮子潼校语,卫天鹏跋,南京图书馆藏;

㉓孙诒让校本,一卷,嘉庆十九年重修曹刻本,杭州大学图书馆藏;

㉔姚觐元《集韵校正会编》,稿本,四卷,姚觐元重刊曹刻本,北京图书馆藏;

㉕丁士涵《集韵札记》手稿,不分卷,上海图书馆藏;

㉖王琨《集韵正》,今未见传本。

《集韵》的序跋除了以上所列15篇外,还有6篇散见于其他文集、专书中,开列如下:

①朱彝尊《合刻集韵类篇跋》,附于“姚刊三韵本”《类篇》卷末,又见《曝书亭集》三十四卷,叶十六;

②桂馥《集韵跋》,见《晚学集》卷三,叶七;

③顾广圻《补刊集韵序》,见《思适斋集》;

④严元照《书集韵后》,见《悔庵学文》卷七,叶四;

⑤钱泰吉《校集韵跋二则》,见《甘泉乡人稿》卷五,叶十二;

⑥陈庆镛《归安姚氏刊本集韵跋》,附于姚刻本《集韵》后。

另有提要一篇,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四十二经部小学类之三。

以上所列《集韵》的校本、序跋并不是穷尽性的清单,《集韵》校本的流传情况是曲折